

GUANYU DANGQIAN
JINGJI TIZHI GAIGE
DE LILUN SIKAO



关于当前
经济体制改革
的
理论思考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 020 6636 1

关于当前经济体制 改革的理论思考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国平
封面装帧 王 俭

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思考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10 字数 212,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4074·636 定价 1.70元

目 录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与观念改革

- | | |
|---------------------------|---------|
| 观念必须科学化..... | 胡守钧(1) |
| 从认识的主体性看观念变革的必要性..... | 陈锡喜(7) |
| 略论“观念群”更新以及思维方式变化趋向..... | 李君如(15) |
| “结合型”是观念变革群体中的一个重要层次..... | 陈幸亮(26) |
| 树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 | 陈伯庚(35) |

所有制的改革和结构调整

- | | |
|-------------------------|---------|
| 所有制改革与经济运行机制..... | 曹之虎(43) |
| 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和所有制改革..... | 黄礼新(55) |
| 城镇集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再认识..... | 王国诚(64) |
| 股份所有制——我国公有制的一种新形式..... | 蔡来兴(76) |

发展横向经济联合

- | | |
|---------------------------------|----------|
| 扩大再生产的第三种形式初探..... | 沈峻坡(85) |
| ——兼论我国经济横向联合的理论意义和战略意义 | |
| 试论横向经济联合的战略目标..... | 李斗垣(94) |
| 科技与经济的横向联系应该实现几个转变..... | 林起章(101) |
| 对发展物资流通领域横向经济联合重大意义的
认识..... | 徐经颐(108) |

- 关于横向经济联系中的劳动力流动问题 葛寿昌(114)
发展企业集团与调整上海产业结构 朱敏 朱镇邦 夏健明 夏大慰(120)
谈谈企业群体内的伙伴关系 邓祥官(131)
——上海锅炉厂开展横向经济联合的情况

搞活企业

- 企业长远发展行为与经济体制改革 史正富(136)
——兼论集体企业超前实行股份化的意义
变直接管理为导向型管理是增强企业活力的必要
条件 朱展良(148)
搞活大中型企业与财政税收 徐日清 顾丽萍(154)
社会主义企业风险的若干问题探讨 陈亚民(164)
100户国营企业扩权现状调查 杨逸(174)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 试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体系 袁恩桢 顾光青(186)
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结构初探 陈幼其(196)
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资金市场浅见
..... 徐日清 来祖荫(208)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劳动力市场
..... 王国平 曹均伟(219)
上海各类市场的现状、问题和建议 陈浣青 倪强(229)

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

- 关于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的理论思考 张晖明(239)

关于实行间接控制的几个问题	张淑智(248)
关于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的对策建议	蔡来兴(257)
关于中央银行从直接控制为主向间接控制为主 转化问题的探讨	陈泽浩(265)
论完善消费基金的宏观控制	童源轼 钱世明(274)

扩大对外开放

加速上海市出口导向战略步伐的几点意见	王新奎(281)
· 谈谈上海利用外资的几个问题	杨公朴 杨建荣(289)
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探索我国的出口生产体系	徐人麟(298)
对外开放须以改革为前提	蔡星火(308)
编后记	(313)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与观念改革

观念必须科学化

胡 守 钧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社会变革，思想先行。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人们的观念必须现代化。

怎样实现观念现代化？有的主张时间观念现代化，有的强调强化竞争观念，有的认为必须铲除妒才嫉能的心理，有的提倡穿西装、吃面包、讲卫生，等等。毫无疑问，各种议论自有一定价值。但是，应当指出，上述意见皆未抓住根本，只作了些枝节末梢的文章。观念现代化，涉及各种文化形态。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种社会科学，皆须研究新问题；其范围之广泛，情况之复杂，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然而，究其根本，所谓观念现代化，实质上就是观念科学化；唯有借助科学变革观念，才能实现观念现代化。

科学是当代人类文明的基础，现代文化的核心。一方面，科学可以转化为技术，促进生产力，更新生产结构；另一方面，科学结构明晰，论证合理，方法可信，向来是其他文化形态的凭借和依托，科学的每次重大突破，都会强烈地震撼人的心灵。

激发思想更新。因此，科学是人的观念进化的强大动力。具体表现为：

第一，科学可以物化为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更新社会结构，从而改变人的观念。例如，经典力学促进了工业化社会的诞生，因而带来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新观念。

第二，科学的发展，突破旧的传统观念。人的观念，形成于一定的科学背景。科学的发展更换了观念的科学背景，必然导致人的观念更新。例如，中世纪的人类中心论依托于地心说，因此，一旦日心说取代地心说，就不可避免地酿成了人的观念变革的大风暴。

第三，科学的发展，迫使旧的传统观念衍生出新的解释，具有新的弹性。由于各种原因，有的人固执地坚持某种观念。当新的科学与旧观念发生冲突而又无法抹煞科学时，他们就会被迫对旧观念作出新的解释，以便容纳新的科学。例如，上帝观念形成以来，在科学浪潮的冲击下多次更新其内涵。哥白尼迫使上帝更换体系，开普勒将行星三定律塞给上帝，牛顿教上帝懂得力学，达尔文命令上帝不断创世和启示。至于当代，上帝观念更富于弹性。

第四，科学借助类比，不断产生新的观念。几何学借助类比产生了几何的宇宙观；牛顿力学借助类比产生了宇宙机械论和社会机械论；进化论借助类比产生了进化哲学、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化伦理观；熵借助类比进入社会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等。

第五，新的科学方法，产生新的思维方式。如理想模型法运用于进行社会试验和设计各种理想社会；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方法被广泛地用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等等。

随着四化建设的发展，体制改革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日趋尖锐。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所以积弊甚多，溯本求源，乃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经历过近现代的科学化运动，缺乏近现代的科学精神。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地理环境诸原因，当世界已进入科学世纪时，而中国尚未形成以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神州大地仍处于愚昧的儒学笼罩之下。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亚洲巨人。迫于世界潮流的撞击，中国当局同意引进近现代科学。

引进科学，方法至关紧要。不仅吸取具体成就，还要吸收科学研究所的思想方法，并将科学精神注入传统文化之中，促使观念更新，此为求本法；如果只借用具体成就，不用科学改造思维方式和传统文化，便是求末法。本固叶茂，不言而喻；舍本求末，则无济于事。明治维新时代日本学习西方学术，求其根本，成效卓著；罗马帝国时代，罗马人学习希腊学术，舍本求末，留下了科学衰败的教训。两种方法，两条道路，造成两样结局。由于清王朝固有的反动性和保守性，学习伊始，便重蹈罗马人的覆辙。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学习运动纳入旧轨道。所谓学习，不过借来点具体科学成就，装扮传统，假赶时髦，侍奉儒学。花样翻新，骨子依旧，岂能成功？

伟大的五四运动，掀起科学与民主的狂飙，横扫孔家店，力图用世界先进科学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然而，由于反动势力过于强大，传统文化极端封闭保守，教育落后，文盲众多，科学精神难于植根，其结果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潮得势。

欲改革旧的文化传统，更新人的观念，“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不行；反之，“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也不行。我认为，必须以“科学为体，国学为用”，实现观念科学化。

什么是“科学为体”？科学不是哪个民族的私产，而是全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晶；科学并不隶属于哪个民族文化，而是人类文明的核心。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科学化的过程。所谓“科学为体”，就是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创的事业，以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以及近现代科学的优良传统，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构架、思想基干、精神核心。什么是“国学为用”？中华民族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艺术形式、审美情趣、民族心理。所谓“国学为用”，就是使科学精神和传统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获得中华民族的表达形式。

科学为核心，国学为形式，科学精神民族形式化，这就是“科学为体，国学为用”。

首先，应该认清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同源性，中华民族可以引进世界先进科学与先进文化。各民族虽然千差万别，但是，其根本相同：一曰同住地球，生活环境同；二曰同需衣、食、住、行、性、知，欲念同；三曰同有生、老、病、死，生命历程同；四曰同需渔、猎、耕、工、商，生产与交往活动同；五曰同需群居、管理、内政外交，社会活动同。中西文化，亦有许多相同之点。例如：先有神话，并皆认为世界起源于水；文学之中，先有诗歌；科学之中，先有算学、天文学、占星术、炼金术；等等。要看到中外文化的同源性，不应过分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倘若本源不同，怎能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科学与别国优秀文化？

其次，应该认清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世界先进文化的差别是时代之差，急需迎头赶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古典科学为

背景，世界先进文化以近现代科学为背景，科学背景不同，文化自然不同。背景依旧，文化焉新？为了振兴中华文化，急需改变科学背景。随着改革的深入，科学为体，势在必行。

最后，应该认清唯有科学化的观念，才能建立起科学化之中国。当代科学日益深入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世界日趋科学化。欲与科学化的世界对话，必须依靠科学化的观念。改革的目的，就是加速社会生活的科学化。因此，必须同时加速观念的科学化。

“科学为体，国学为用”，有益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这从何入手？

第一，要努力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领悟科学之精神。不仅吸取具体成果，还要研究它是如何形成的，广泛借鉴科学中的新观点、新思想，推动传统观念的变革。

第二，要努力学习文艺复兴以来的世界近现代科学的优良传统。必须对科学传统与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比较研究，剖析中国旧文化传统之弊病。还要正确对待历史上的成就。中国古代有过伟大的科学成就（如四大发明等），但是后来落后了。我们要正视事实，不要做新时代的阿Q；也不要盲目地跟在外国人后面，颂扬中国的文化传统。文明古国确有不少瑰宝，应当合理继承。但是，必须冷静地认识到，与世界先进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落后性是显见的；对四化建设而言，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病也是显见的。切莫因为外国人夸了几句中国的老古董，便喜形于色，得意飘然，而忘却了改造传统的艰巨任务。中华儿女应当热爱祖国，提高民族自豪感。但是，爱国并不等于热爱旧文化。所谓民族自豪感，就是要有巍然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奋然前进，自强不息，并不是

保持旧传统，固守旧观念。

第三，要努力学习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借用科学方法研究文化。方法为思想之工具。方法更新，是文化更新的前提，没有新方法，就没有新文化。因此，决不能因袭寻章摘句的“注经”手法。

第四，要善于借鉴世界各民族观念科学化的经验及其具体成就，吸取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如许多重要典籍没有译本，许多重要文化流派未作认真介绍，大凡论及外国学者，也是泛泛而谈，且概念化的批评多于实事求是的研究。

第五，要探讨科学精神如何民族化。内容离不开形式。我们应该考察中华民族的心理特点、风俗习惯，分析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研究各种艺术形式的特性，捕捉群众的审美趋向，寻求科学精神的最佳表达形式。

第六，也是最根本的一条，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理论指导，推进观念科学化，使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马克思说过，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没有科学，就无法改造旧的传统文化，变革人的观念。科学精神注入中国文化之日，就是中华民族的观念现代化之时。

从认识的主体性 看观念变革的必要性

陈 锡 喜

最近一个时期，变革旧观念的呼声越来越高了，这是改革和开放深入发展所提出的必然要求。但是，要变革那些阻碍改革和开放深入发展的旧观念，并不是没有阻力的。这些阻力除了来自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的各种因素以外，还有一个认识上的因素，就是有些同志根本否认观念变革的必要性。这种认识有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就是过去长期宣传的认识论中残留的经验主义因素。对此考察之后不难发现，问题涉及到认识的本质、认识真理性的基础和认识的发展，以及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等。我们只有阐明主体的观念和观念变革在认识形成的本质、检验认识的基础和认识的发展这三方面的作用，才能在理论上为观念变革的必要性提供充分的依据。

第一，从认识形成的本质来讲，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的形成都不仅仅取决于客观事物的单向作用，而且包含了已有观念的作用，人们是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①的，即是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页。

用一定的观念来看待周围的客体的。

就经验知识水平而言，人们的观察经验决不是纯客观的。因为首先，观察经验具有选择性，而选择的标准受到已有观念的影响。其次，人们可以对观念经验赋予不同的解释，而不同的经验解释亦是已有的不同观念作用的结果。例如，设想托勒玫和哥白尼同在一处看日出，哥白尼会说，他看到了地球在朝下转，而托勒玫则坚持认为，他看到的是太阳在升起。再次，我们所获得的客体的观测值是否是绝对的，这一问题依不同的观念有不同的答案。根据相对论，客体的观测值依主体对参考系的不同选择而变化，根据量子力学，客体的观测值依主体的观测手段的不同而变化，然而，根据牛顿力学，客体的观测值是唯一的、不变的。你信奉哪一种观念，你就会对经验观测值取何种态度。可见，人们的经验知识不仅仅取决于客观对象本身，而且受到已有观念的影响。

就理论知识水平而言，人们对客体的信念进行加工组合以后，它的内容远远超出了经验知识所提供的东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已有的观念在加工组合信念时，作为一种基本框架起了作用。首先，要建立一个理论体系，都需要有一些对某一领域的经验现象作总体把握的出发点，这些出发点就是一定的观念。许多教科书把开普勒和爱因斯坦说成是经验归纳的典范。实际上，开普勒是有他的出发点的，那就是“宇宙呈简单的数字和谐”的观念；他坚信行星轨道越简单，越符合宇宙的本来面目。他以这一观念来重新组合观测材料，大胆地以椭圆轨道取代了历来的正圆轨道。爱因斯坦的出发点是“世界统一性”和“理论体系的简单性、完备性”观念。当适合于牛顿力学的伽利略变换与电动力学发生矛盾时，爱因斯坦坚

信这种不对称不应该是现象固有的。他大胆地把抛弃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作为解决这种不对称的出路，把相对性原理推广到了电动力学，从而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其次，任何理论体系的建立，都需要一定的假说观念，否认假说，片面强调经验归纳，无异于否定科学。牛顿声称他不用任何假说，强调任何概念都必须有实验根据。然而，他创立牛顿力学的科学方法却摆脱不了假说，他的绝对时空观念和万有引力观念就是超经验的假说。爱因斯坦充分肯定了假说的作用，因而能自觉地运用假说。“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在牛顿力学框架内是不相容的，然而爱因斯坦毅然把这两个原理作为演绎体系的两个公式，使它们得到了统一。可见，理论知识并不仅仅取决于经验知识，人们以一定的观念框架去重新组合和改造经验内容，才能在理论水平上理解超出这些经验内容的更普遍的现实。

第二，从检验认识的基础来说，实践对真理的判定具有相对性，因为实践不仅具有社会历史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实践标准中内含了一定观念的作用。

就实践的社会历史性而言，它既体现在实践的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上，更体现在实践的中介手段即工具上。客体的范围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主体的实践能力是一定历史的产物，而工具既是某一历史时代实践水平的客观标尺，又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时代的实践，都无法对理论的绝对的普遍必然性作出证实，它能够确认的只是：某某理论，在某种条件下是正确的。

就实践标准渗透了理论观念而言，它更不能证实理论的绝对的普遍必然性。理论的普遍必然性不可能由具体的历史

的实践所穷尽，具体的实践甚至也无法证实理论绝对正确的概率度，因为与理论所要求的普遍必然性相比，某一历史时期的实践所能达到范围的概率趋向于零。既然如此，实践能够检验理论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承认实践能检验理论的相对的普遍必然性，是因为实践除了具有直接现实性的优点外，还具有普遍性的优点，即在相同条件下的实践，总能获得相同的结果。这是实践区别于经验的最主要的特点。然而，这个优点恰恰源于理论观念的渗透，实践是在一定理论观念指导下的改造客体的社会活动，理论观念的普遍性给实践带来和补充了普遍性。

于是，理论观念对实践的渗透，对实践标准具有双重意义：既使实践能够成为检验认识的标准，又使这种标准具有相对性，即它使得人们对在理论指导下所设计的实验产生的结果，可能作出不同的解释。例如，对光的反射实验，既可以说明微粒说：光是由微小弹性球组成的射线，碰到反射面，按力学规律被反弹回来；又可以说明波动说：光是一系列纵波，它的波阵面遇到障碍物时，产生次波，而次波包络面的轨迹，便是反射光的方向。由于观念对实践的渗透，更使得人们在宣称某一实践证实了某一理论时，实际上需要更强有力的观念的支持。例如，当日心说断定地球是围绕太阳转动时，人们习惯于用石头落下不会掉到人的身后去的实验来维护地心说。伽利略意识到为了使这一实验转而支持日心说，必须引用一套新的观念，这就是相对性原理。这一原理指出，在一个惯性系内通过一切力学实验都不能断定这个惯性系相对于另一个惯性系的匀速运动状态。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随地球一起运动，我们并不能觉察地球在运动，而石块落在自己的脚跟

边，并不能证明地球是静止的。

由于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使得无论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都不存在所谓一次性的判决性实验。正如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①一次或几次实践支持了某个理论，并不等于它完全证实了这个理论体系的所有方面；一次或几次实践反驳了某个理论，也不等于它彻底证伪了这个理论体系。因为这里的支持也好，反驳也好，都包含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观念对理论的关系。例如，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科学家傅科测定的光在水中比在空气中走得慢的实验判决了光的微粒说的死刑，然而，本世纪初诞生的光的量子论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重新肯定了微粒说的合理因素。

由上可见，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是一个历史过程，一个理论在某种历史条件下所受到的实践的检验都具有相对性，因而它决不是一劳永逸的。社会实践每前进一步，就要对理论作新的检验，理论就必须通过自己的变化和发展来经受这种检验。

第三，从认识的发展来看，它并不仅仅是一个相对真理的量的积累过程，而且包含了质变的过程，它表现为理论观念的变革所引起的科学和实践的新的重大的起飞。

任何新理论诞生后，它要站住脚的三个条件是：(1)理论内部是自治的；(2)能够解释以前的理论所能解释的问题；(3)能够预见新的经验事实。这就决定了理论的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2页。

